

## 正確理解中國：世界史視域中的東亞

• 戈德斯通

(Jack A. Goldstone)

這部文集不僅展示了關於帝國晚期和現代時期東亞經濟的最優秀的近期研究成果，而且使我們得以在更廣闊的全球和世界史背景下來觀照東亞經濟。所謂的「全球」背景是指，本書作者探討了東亞經濟各組成部分（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的運作情況，而且還進一步探討了這些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以及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印度、俄羅斯、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所謂的「世界史」背景是指，各章作者將東亞的經濟變遷與過去兩個世紀全球發展和變遷的動態過程聯繫起來。從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歐洲帝國主義、中國共產主義一直到日本和新興工業國家（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工業化和財富創造，均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

按照某些人的看法，在十九世紀晚期或二十世紀初期以前的東亞經濟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是貧困的、難以自給自足的農業家庭，它們用貢稅和地租養活了一個有閒的精英階層（文人學士和官員）。對仍然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來說，本書將提供一帖滋補劑和興奮劑（必要時還將提供一帖解毒劑）。本書清楚地表明，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和日本出現了大量的商業和製造活動，涉及種類繁多的消費品。大多數農村和城鎮家庭都參與了這類活動，它們同時成為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不僅如此，正如濱下武志撰寫的那個章節所表明的，中國還形成了一個豐富而複雜的海外貿易體系，直到十九世紀歐洲列強入侵中國以後，與東亞其他地區的這種貿易往還仍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本書還有助於糾正這樣一個論調：在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前，中國是一個鐵板一塊的國家，在其統治疆域內從未受到過任何挑釁。事實上，正如普度討論中國領土疆域的精彩章節所表明的，當時的中國一直都與其他亞洲國家處於相互競爭和衝突的關係中，而且往往是輸家。從北宋的傾覆到蒙古人的入主中原再到滿族的征服，「中國」不斷遭到蠻夷的蹂躪。無論誰統治中國，他都總是對那些在技術上與中國不相上下，甚至比中國更先進的亞洲內陸勢力和北亞勢力採取一種戰爭姿態。就連甚麼是「中國特徵」這個問題也經常引起爭議，因為滿族人即使在統治了中國數百年之後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獨特語言和文化。

本書各章描述了中國和東亞的貿易和製造業網絡，輪廓鮮明，細節清晰，從中華帝國晚期的商人網絡到日本在十九、二十世紀對技術創新的吸納，均有充分論述。舉例來說，某些從事十八世紀英國研究的學者——如布魯爾（John Brewer）和波特爾（Roy Porter）——認為，英國之所以發生工業革命，是由於出現了对多樣化的消費品的與日俱增的需求。這種需求造就了國內市場和一些地區製造業特產的出現，例如斯塔福德的陶瓷、設德蘭的羊毛織物、愛爾蘭的亞

本書有助於糾正這樣一個論調：在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者入侵中國以前，中國是一個鐵板一塊的國家，在其統治疆域內從未受到過任何挑釁。事實上，普度討論中國領土疆域的精彩章節表明，當時的中國一直都與其他亞洲國家處於相互競爭和衝突的關係中，而且往往是輸家，「中國」不斷遭到蠻夷的蹂躪。

麻織品、設菲爾德的刀具、伯明罕的金屬製品和蘭開夏的棉花<sup>①</sup>。韓格理和張維安也描述了類似的情形：「紹興酒、江州茶、湘繡、粵繡、蜀繡、蘇繡、蜀錦、徽州筆硯、福州紙、蘇州年畫、宜興茶具、景德鎮瓷器……在大多數城鎮中心都能買到。在中國一些較富裕的地區，這些商品甚至出現在小型集市上。」（頁191，以下所標頁碼均為該書英文版）讀了這段話，我們應該作何感想呢？實際上，所有這些都不是簡單的地域標記。如同英國的情況一樣，它們更像是商標，標明了一種由商人網絡控制的特殊製造樣式和技術。這些商人網絡使得商品按市場需要進行生產，而市場又受到消費者喜好的驅動。如果說在西方，消費者的需要促進了工業化進程，那麼，中國如何能夠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內支撐這樣一些成熟的全國性消費和生產市場，卻並未踏上工業化道路呢？杉原薰針對日本的情況提出了類似的論點，說明從十八世紀初開始，一場「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如何在農村地區形成了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多種多樣的製造業（產品既供應城鎮市場，又供應當地消費市場），從而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韓格理和張維安（頁199-200）也指出，在西方進口產品剛剛湧入時，中國的製造業並沒有就此一蹶不振。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儘管機紡棉纖維（主要從印度和日本進口，然後由歐洲和日本廠商在中國加工）取代了本地棉紗，但英國的紡織品並沒有取代中國的棉布。事實上，由於有了機紡線，中國的棉布生產得以迅猛增長，從十九世紀70年代到二十世紀20年代，棉布出口增加了將近十倍，中國的布匹甚至出口到了英國！中國的紡織品廠商採用的是傳統技術，它們認識到，紡織品生產不只是將線織成布，而是涉及到不同類型的線的挑選、線的染色和精美圖案的設計，以及在完成構造和最後工序時的不同質量要求。這樣，無論從普通本地棉布來看，還是從供出口的高級精美絲綢和布料來看，中國廠商都在市場上贏得了一個適當的位置，順利跨入二十世紀。換句話說，中國的資本家將計就計打敗了歐洲人，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

因此，中國在整個帝制時代一直擁有一個豐富多彩、充滿活力的政治經濟體系。韓國和日本也有其自身的動力，獲得了自身的發展。既然如此，在十九世紀晚期，以及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裏，為甚麼歐洲國家能夠在經濟上超過東亞，並將其置於從屬地位呢？

針對這個問題，文集的作者們給出了種種不同的答案。有時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堅船利炮：「面對蒸汽戰艦，中國一籌莫展。僅在1841年2月的某一天，蒸汽戰艦就摧毀了九艘戰船、五個堡壘、兩個軍事基地、一個海岸炮台。」（頁293）有時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帝國主義：「總而言之，在十九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自始至終有賴於印度的朝貢。依靠印度的貢賦，英國的公共開支在1792-1815年間增加了六倍，從而為英國在資本貨物產業中的優勢地位奠定了基礎。英國在未來半個世紀一直享有這種地位。」（頁290）還有的時候，作者給出的答案是：「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構成了技術革新的主要動力，正是這些技術革新最終讓歐洲體系取得了全球統治地位。」（頁265）

既然中國在整個帝制時代一直擁有豐富多彩、充滿活力的政治經濟體系，為甚麼歐洲國家能夠在經濟上超過東亞，並將其置於從屬地位呢？文集的作者們給出種種不同的答案，包括堅船利炮、帝國主義以及「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構成了技術革新的主要動力，正是這些技術革新最終讓歐洲體系取得了全球統治地位。」

透過這些觀點往回看，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的迴圈似乎難以解釋歐洲何以取得了優勢地位，因為正如本書所表明的，中國從1600年到1800年的歷史恰恰就是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的歷史。在這幾百年的時間內，中國統治的疆域向北擴展到滿洲，向西擴展到中亞，向西南擴展到西藏，向南越過珠江三角洲一直擴展到越南。與此同時，中國成了世界上流動資本最大的巢窟。不少國家為與中國進行貿易而專門製造了船隻，這些船隻將成噸的白銀從日本、從歐洲、從美洲經小呂宋直接運往中國。如果說這個時期的歐洲與亞洲有甚麼區別的話，那麼，最主要的是看歐洲人用領土和資本做了甚麼事情。單純擁有領土和資本，這說明不了甚麼問題。

這樣就涉及到了帝國主義的問題——印度的朝貢讓英國成為世界的主宰了嗎？本書提供的資料與奧布賴恩 (Patrick O'Brien) 已經得出的結論遙相呼應。奧布賴恩認為，英國的帝國主義並沒有帶來足夠的利潤以平衡英國的公共開支<sup>②</sup>。阿里吉等引用了同時代的帳目，表明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815年確實「向英國財政部交納了一大筆錢，使整個國家從公司獲得的歲入達到600萬英鎊」(頁292)。這聽起來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我們把書往前翻六頁，就可以讀到這幾位作者告訴我們的情況：從1792年到1815年，英國的公共開支從2,200萬英鎊增加到1億2,300萬英鎊。由此看來，東印度公司上交的收入還沒有達到公共開支的百分之五。當然，如果以年度作為核算單位，重要的不是總的開銷，而是累計債務的利息，政府年度開支的依據正在於此。但即使如此，幾位作者也注意到，1815年英國公債的年度利息為3,000萬英鎊。由此看來，印度的朝貢還不足以支付公債年度利息的百分之二十，另外百分之八十來自其他地方，主要來自國內。

剩下的就是蒸汽動力和技術了，這確實是英國獨具的優勢。但即使在這裏，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英國的發展道路並不是唯一的發展道路。彭慕蘭和杉原薰撰寫的那幾個章節表明，英國之所以能夠在製造業方面取得這樣的效率，完全是因為她把工人趕到工廠裏一塊勞動，而中國和日本以家庭為單位對勞動力進行精細分配，同樣也取得了很高的效率。不過，本書涉及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材料都按通行的做法，僅僅強調了資本的積累和生產的擴大，彷彿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式的增長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當代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式的增長。事實上，熊彼特式的增長涉及到如下幾個方面的協作：快速產生新發現的科學、科學工程、產品和工序革新。我曾在別的地方指出，我們如果不仔細關注科學技術在改變能源基礎方面的作用，以及製造方法在歐洲經歷的發展變化，就不可能理解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為甚麼在十九世紀出現了那麼大的差異<sup>③</sup>。卡贊斯坦是強調了技術進步的關鍵作用的主要作者，他說明了二戰後的日本是如何巧妙地學習、利用和革新生產技術並最終取得成功的。

最後，本書暗示出，歐洲的經濟優勢可能只是暫時的。在1800年以前的幾百年時間裏，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她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末重新奪回這種地位。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迅速趕了上來，實

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的迴圈似乎難以解釋歐洲何以取得了優勢地位。因為中國在1600年到1800年的歷史恰恰就是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的歷史，中國統治疆域大幅擴展，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流動資本最大的巢窟。單純擁有領土和資本，這說明不了甚麼問題。如果說這個時期的歐洲與亞洲有甚麼區別的話，那麼，最主要的是看歐洲人用領土和資本做了甚麼事情。

本書暗示出，歐洲的經濟優勢可能只是暫時的。中國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末重新奪回這種地位。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日本和韓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為它們採取了與歐洲不同、但卻行之有效的策略去調動勞動力，融入全球市場。沒有甚麼能夠阻止中國（和印度）做同樣的事情，只要它們的政治系統決定這樣做。果真如此的話，「東亞的復興」就會如虎添翼。

在令人驚歎。本書認為，這兩個國家之所以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因為它們採取了與歐洲不同、但卻行之有效的策略去調動勞動力，讓資本具有適應性，融入全球市場。沒有甚麼能夠阻止中國（和印度）做同樣的事情，只要它們的政治系統決定這樣做。果真如此的話，「東亞的復興」就會如虎添翼，再過二三十年，人們在寫書時就會回過頭來反思今日歐洲的全球霸主地位，發現這種「暫時的高漲」不過是一個令人驚歎、但卻轉瞬即逝的現象而已。

### 註釋

- ①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② Patrick O'Brie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 120 (1988): 163-200.
- ③ Jack A. Goldstone,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issue 2 (2002): 323-89.

戈德斯通 (Jack A. Goldstone)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公共政策及傑出學人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及歷史社會學、集體行動的分析等。著有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991)，並主編 *Revolutions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1)、*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1998)、*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2003) 等。

## 解釋東亞的復興

● 趙永佳

《東亞的復興》是一部以其真知灼見和開闊的分析視野見稱的出色論文集。正如該書序言所述，本書有兩個分析軸心：一、根據三種不同的時段考察東亞的發展（500年、150年和50年）；二、將東亞視為一個世界區域 (world region) —— 這裏所說的世界區域是指「幾組在廣闊的領域裏明顯地相互依賴的毗鄰國家。這些領域在空間上互有差異，在時間上經歷了演化發展」（頁5）。隨後的幾篇論文生動地說明了如何透過這兩個分析視角富有成果地分析該地區的動態特徵。

本書的強項在於，它對處於近代早期的該地區的狀況進行了歷史描述。彭慕蘭的論文概括地描述了東亞的婦女勞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如同本書其他幾